

## 从图书馆学视角看校雠学的近代境遇\*

□刘春云 龚蛟腾

**摘要** 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与传统学术大转型的近代时期,尽管校雠学学者群体蔚为大观、研究成果持续涌现且思想精髓承前启后,但其发展亦面临重道轻器弊端积重难返、西学东渐潮流摧枯拉朽和近代图书馆学强势冲击等诸多困境。随着传统校雠学的逐渐分化与急剧变革,图书馆学日渐扩张而承其主体,目录学日益敛缩而偏安一隅,其他文献类子学科亦各取所需而扬其思想。校雠学的近代境遇实际上是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是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等文献类学科群的显性化过程。

**关键词** 校雠学 图书馆学 学术转型 近代境遇

**分类号** G25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7.03.015

## 1 引言

前期研究成果表明:古代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演变,就是中国图书馆学的一次重大转型<sup>[1]</sup>。晚清以降,中国进入从中古东方式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社会型态的近代社会转型时期<sup>[2]</sup>。学术转型与社会转型如影随形<sup>[3]</sup>,中国传统学术随同政治、经济等一起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考验。“在西学东渐的近代语境下,欧美学科分类的理念及方法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发生裂变,逐渐向近现代学术转型,传统知识系统开始逐渐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中”<sup>[4]</sup>,作为中国传统学术重要门类的校雠学面临同样的境况。校雠学萌芽于先秦,肇始于西汉,确立于南宋,极盛于有清,其鼎盛期出现于乾嘉时期,此后校雠学越过升降交点而进入分裂期。如果说清代中期以来校雠学内部发生的分裂是其“盛极而衰”下愈演愈烈的“内忧”,那么清末以后西方学术理念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冲击则是校雠学突如其来的“外患”。在此双重因素的发酵与催化下,近代堪称校雠学史上最错综复杂且最精彩纷呈的演化时期,恰如新夏老前辈所言“转型期的历史是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最富内容,最值得着眼的重点”<sup>[5]</sup>。近代以来,西学强势碾压中学,以西方新理新法治旧学——

即用西方学科理念重新整理中国固有学术——一时成为治学风尚,于是传统校雠学在西方学科体系的框定下逐渐分化与转型。校雠学的近代境遇实际上是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是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等文献类学科群的显性化过程。

## 2 校雠学的承传与发展

## 2.1 校雠学学者群体蔚为大观

中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把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者称为校雠学家。古代校雠学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其中刘向、刘歆、长孙无忌、郑樵、胡应麟、章学诚等为校雠学的确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清末民国,新一代校雠学者斟酌损益前贤的理论成果,潜心于传统校雠学的学术研究,形成了近代蔚为可观的学者群体,只不过当时的校雠学家与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等称呼存在交叉使用的情况。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有以刘纪泽、余嘉锡、汪国垣为代表的史的目录学家,以叶德辉、孙毓修、柳诒徵为代表的版本目录学家,以刘咸炘、张舜徽、蒋伯潜为代表的校雠目录学家,及以姚名达为代表的“中西

\* 湖南省教育厅开放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之演进研究”(项目编号:17K095)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龚蛟腾,ORCID:0000-0001-7765-2822,jtgong2005@163.com。

合璧”式目录学家<sup>[6]</sup>。其实无论哪个派别都可以“校雠学家”统称,因为古代校雠学包含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内容,是名副其实的“一家之长”。另外,“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按其学科背景来划分,有人数较多的两大类,即文献学家和图书馆学家”<sup>[7]</sup>。民国图书馆学人中大多在“整理国故”的学术氛围中大力研究传统校雠学(文献学),如杜定友、金敏甫、李俨、傅增湘、李钟履、万国鼎、袁同礼、王重民、刘国钧、柳诒徵、钱亚新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国学功底深厚,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脉和血统,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审慎汲取西学精髓。他们“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即在传承郑樵、章学诚校雠学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从而铸就了中国近代校雠学发展史上的丰碑。

## 2.2 校雠学研究成果持续涌现

从《别录》《七略》到《校雠略》《校雠通义》等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经典序列,共同构成了校雠学学科精粹的核心知识文本链条<sup>[8]</sup>。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又产生了诸多衍生文献,尤其是民国时期涌现出许多校雠学研究成果。一是以校雠学命名的著作相继问世,如杜定友的《校雠新义》(1930年)、胡朴安与胡道静的《校雠学》(1934年)、蒋元卿的《校雠学史》(1930年)、向宗鲁的《校雠学》(1944年)、蒋伯潜的《校雠目录学纂要》(1944年)、刘咸炘的《校雠述林》和《续校雠通义》、程千帆的《校雠广义》(20世纪40年代)<sup>①</sup>、张舜徽的《广校雠略》(1945年)等;二是校雠学相关研究论文屡见不鲜,如刘师培的《校雠通义箴言》(1913年),钟肇鹏的《校雠通义评误》(1947年),马太玄的《校雠学之意义及其历史》(1935年)等。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图书馆学刊物——《图书馆学季刊》“著者略历”中的统计数据也证实,排在前20位的著者所发表的文献目录学方面的论文数量比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数量要多<sup>[9]</sup>。西方图书馆学的输入经由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过程,当时西式图书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限,相关专业期刊大量采用传统校雠学的文章属正常现象,体现了近代图书馆学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学术特征。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图书馆“援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便是校雠学映射在图书馆学上的成果。另外以《目录学发微》《中国目录学史》为代表的目录学著作和以《书林清话》《中国版本源流考》为代表的版本学著作等,也是校

雠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校雠学研究成果持续涌现,是中国古代校雠学理论与实践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西方学科理论的影响密不可分,而近代学人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恪守也是一重要原因<sup>[10]</sup>,代表了郑、章校雠学思想在近代的发展。因此,近代可谓校雠学研究成果出炉最集中、最系统的时期。

## 2.3 校雠学思想精髓承前启后

近代以来,一批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学者,既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思想,又极力推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传承,经由他们呕心沥血浇灌的学术成果必然也带着传统与革新的烙印。杨翔宇认为近代校雠学理论著作有回归刘向校雠学本意、重视校雠学史以及求真务实、广搜博采的理念与特色,对现代编辑学、文献学、图书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sup>[11]</sup>。若“回归刘向校雠学本意”和“重视校雠学史”是“承前”,那“对编辑学、文献学、图书馆学产生深远影响”则可谓“启后”,我们可从其中几部代表性成果的分析中了然此意。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将古今中外目录学思想融为一炉,是民国时期第一部由系统学习过西方图书馆学的本土学人撰写的校雠学著作”<sup>[12]</sup>。张舜徽从《广校雠略》到《中国校雠学概论》所构建的会通校雠学,则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准备了条件,即为其文献学的建设准备了条件<sup>[13]</sup>。程千帆的《校雠广义》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作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隶属于校雠学这门学科之下,同时又将它们相互独立,各自成编,将校雠学这门歧义颇多的传统学问建设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实用性很强的完整学科<sup>[14]</sup>。由此足以管中窥豹,近代校雠学研究成果的确上承旧学(校雠学),下启新学(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文献类学科),既有对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对西方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这是近代学人在这一特殊变革时期“中体西用”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仅就图书馆学而言,近代校雠学学者群的校雠学研究成果,不但是中国图书馆学必不可少的学术源泉,而且是图书馆学保持民族

① 20世纪40年代程千帆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讲授校雠学,其时独撰的《校雠广义》初稿未正式出版;1978年程千帆在南京大学重新讲授校雠学,此后他与徐有富在初稿基础上修订“校雠”“目录”两篇并重写“版本”“典藏”两篇,于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

本色不可或缺的思想底蕴。

### 3 校雠学的困境与尴尬

#### 3.1 重道轻器弊端积重难返

道器之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一个重要命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如影不离形。传统学术历来重视一以贯之的“道”,校雠学亦如是。程焕文曾中肯地指出: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校雠学(目录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道轻器——重精神轻物质,重义理把握轻器物制造。一方面,“道”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校雠学理想,通过类例、类序、解题等来追求至善至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道”境界,以此达到“申明大道”的目的。另一方面,“器”又被中国古代校雠学家所轻视和排斥,中国古代校雠学对不能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宗旨之“器”——书目——采取鄙夷、讥议、排斥的态度,所以中国古代校雠学自汉以后在制度的层面上一直是在一条死胡同中发展,并无多少革新进步<sup>[15]</sup>。古代校雠学长期从属于史学,史学视野决定其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文献及背后文化的来龙去脉与渊源流变,注重学术分类与辨考的传统便由此形成,这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也是相得益彰的。只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强大外来文化的刺激,“由器求道”的价值取向,深化、蜕变为“由器护道”的“崇器”倾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及后来的“中体西用”说都是这一“道器观”的变相表达。这种道器观的变化,是传统价值观向近代性蜕变的根本标志<sup>[16]</sup>。西方语境下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甚至被“祛魅”,杜威的实用主义对整个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校雠学过分强调学术辨考价值而对图书管理技术方法不屑一顾的缺点使其在近代化进程中步履维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重道轻器为价值取向的校雠学“术”不如人,逐渐淹没于执“技术”与“实用主义”牛耳的近代学术热潮中,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申明大道”的学术旨趣也以“科学”的名义一度遭到学界的质疑与评判。

#### 3.2 西学东渐潮流摧枯拉朽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是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西学东渐”指西方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对中国近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促进了近

世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sup>[17]</sup>。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重创了中华文明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优越心态,客观上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促使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反思。他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学习西方文明的必要,甚至有人认为传统学术和民族文化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在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这些时代先驱继而赞同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更有甚者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sup>[18]</sup>。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当时为部分知识精英所厌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一度甚嚣尘上。依据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及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知识之内涵进行整理,并创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新学科体系,已成为与西方学术接轨的必然趋势。校雠学是中国古代特殊历史传统与特殊文献形式决定下的特殊产物,西方学科体系中没有能跟其完全吻合的学科。中国文化因丧失话语权而“言必称希腊”,西方学科名称及学术范式成为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标准,于是运用西方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校雠学进行“肢解”“剪裁”“嫁接”成为“正途”,校雠学自身发展轨迹被打破。假如任由中国古代学术独立自主地发展,那么产生一脉相承的校雠学或基于校雠学的文献学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现在所说的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学、版本学等都是这个学科的组成部分<sup>[19]</sup>。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西学东渐潮流摧枯拉朽,东来的西方近现代学术重视分科治学与理性精神,强调学术的深入和细化,校雠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 3.3 近代图书馆学强势冲击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裹挟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独有、封闭、专享的古代藏书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源于藏书整理实践且重道轻器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校雠学)也不能适应新式图书馆经营管理的要求,而公共、公开、共享的图书馆及重技术方法的图书馆学恰好弥补了古代藏书与校雠学的种种缺陷,于是介绍和探索西方图书馆实践与理论成为近代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早期在中国传播西方图书馆观念与学术思想的主要有五大群体,即西方传教士、开眼看世界之士大夫、维新改良

派、政府开明官吏以及地方贤达士绅。他们或在著述中提及与介绍西方图书馆,或奏请朝廷设立图书馆,甚至制定图书馆章程<sup>[20]</sup>,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末维新变法以后,建立图书馆和办学校、开报馆、译印东西文字一同被当作启迪民智的重要举措引入中国。因此,一大批新式图书馆纷纷成立,图书馆术语、图书馆概念、图书馆译著、图书馆学思想等也纷至沓来。社会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认识日臻成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和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图书馆学从无到有、由点到面不断发展壮大,并于20世纪20年代正式确立。我国古代基于藏书活动发展而成的校雠学虽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与西方近代的应用图书馆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图书馆学先驱杨昭哲就认为:“我国向少图书馆,更无所谓图书馆学。古者虽有目录学、校雠学,与现今目录学、书史学相类似,缺乏科学的方法,不足语与图书馆学也”<sup>[21]</sup>。近代新学术范式以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以及学术形式通俗化为基本特征<sup>[22]</sup>,校雠学因循守旧、缺乏科学方法,着实难以和成长于新学术范式“庇佑”下的图书馆学比肩。因此近代西式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成立的时间虽不长但发展迅速,其光芒很快掩盖了校雠学,校雠学无力抗衡而必然走向分化与转型。

## 4 校雠学的分化与转型

### 4.1 目录学敛缩而偏安一隅

李晓明认为“有关‘校雠学’的定义和范畴自清代中期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20世纪上半期更为突出,成了一笔学术遗产”,并将争议总结为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校雠学等同于目录学,第二种认为目录学统领或涵盖校雠学,第三种视校雠学为治书之学,第四种主张广义的校雠学,代表人物是张舜徽和程千帆<sup>[23]</sup>。毋庸置疑,校雠学定义与范围的飘忽不定决定了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始终暧昧不清、欲罢还休,主张校雠者竭力否定目录学来保全校雠学,而主张目录学者为发扬目录学又鼓吹目录学的作用<sup>[24]</sup>,只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争议重点和学术倾向有所偏移。清儒大多以治目录为时尚,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清末学术渐趋融合,以“实用”为主的义理之学渐据上风,就“目录与校雠”而言已出现“校雠目录学”或“目录校雠学”。五四以后,随着

西方学术思潮不断传入,学科愈分愈细,学问越做越精,一些学者出于学科建设需要提出广义“目录学”之说。近代以来,“目录学”与“校雠学”呈融合趋势<sup>[25]</sup>,但依然延续着前朝的两学之争。西学的介入则使它们呈现新态势,双方地位与话语权此消彼长。20世纪初目录学从校雠学中剥离出来,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这“既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也是近代以来目录学自身发展与演变的产物”<sup>[26]</sup>。其实两学之争由来已久,自刘向定义“校雠”开始,关于两学谁是老大的争论就一直绵延至今,只不过清朝中期以后尤甚。郑樵的《校雠略》与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等校雠学著作都有为校雠学正名的愿望,我们认为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校雠与目录之争的产物。历时久远的两学之争以目录学的独立告一段落,这是对接西方学科体系的结果。尤其是1949年以后,由于学习苏联模式,校雠学这门课程连同其他一些相关的基础辅助学科被取消了<sup>[27]</sup>,而目录学却仍然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逐渐替代校雠学名称。当然,目录学虽然从校雠学体系中分化出来并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相对于包含版本、校勘、目录和典藏等在内的庞大校雠学体系而言,目录学通常依附图书馆学而偏安一隅,其研究范围无疑大大敛缩了。

### 4.2 图书馆学日渐承其主体

我国图书馆学发展拥有独特的历史处境和发展路径,古代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图书馆学知识,然而人们却往往认为是清末民初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催生了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其实,尽管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建立“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引进显然大于对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传承”<sup>[28]</sup>,但“中国学者没有简单地充当西方思想的搬运工,而是在引进西方学理的同时,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诉求”<sup>[29]</sup>。1925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倡导“用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来解决西方图书馆学这种‘新知’与中国古代校雠学(梁启超称广义的目录学)这种‘旧学’如何对接的问题”<sup>[30]</sup>。1926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确立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sup>[31]</sup>。杜定友则希望通过“我们向来所有的校雠之学”,在分类编目问题上实现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国化<sup>[32]</sup>。民国诸

多图书馆学学者努力在古代校雠学思想中寻求关联与智慧,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指明了方向。相对于校雠学这个土生土长的“国粹”而言,图书馆学是个从西方舶来的“洋货”,其要在异域生根发芽必须适当“入乡随俗”。况且中国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其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厚与传统价值观念之稳定,更加突显了外来“图书馆学”必须根植本土文化的必要性。只有当古代校雠学思想和近代图书馆学术相互融合在一起,即当西方近代图书馆学术初步完成中国化之时,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20世纪初,西学语境下的图书馆学正式确立。王子舟先生认为图书馆学形成后在20世纪出现过三次高潮,其中第一次高潮(1925—1936年)体现了古代学术的择善传承与近代实业专业体系的拓展,首先是对千百年来在图书整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古代学术的总结与继承,如校雠学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研究和发扬,无论在图书馆学教育中,还是在图书馆著述中,都占有明显地位<sup>[33]</sup>。看似外来的图书馆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本土校雠学的思想内核,或者说校雠学本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图书馆学。

#### 4.3 文献类学科群各取所需

校雠学是古代图书馆学,也是古代文献学。近代在西方影响和知识分化的双重作用下,它由单一的文献学科分化成拥有诸多子学科的“文献类学科群”。文献类学科群同源同宗,除目录学、图书馆学之外,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学、出版学等学科也同校雠学一脉相承。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探讨源于20世纪初,“民国初年是校雠学变身文献学的关键时期,变身的根本原因则是‘校雠学’之名已难以概括文献整理活动的全部内容,其主要推动者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和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他们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对文献学的初创起了奠基作用”<sup>[34]</sup>。“文献学”始见于梁启超1920年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之后他在演讲和著述中也多次提及“文献学”“文献之学”“文献学问”等名目。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氏兄弟《中国文献学概要》,是中国最早以“文献学”直呼其名的著作,“该书的体系结构缺少内在的逻辑性,体现了古代文献学脱离‘校雠学’之名的初期,理论研究的片面性和迷盲性,因而该书问世以后未能引起学术界必要的重视,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sup>[35]</sup>。正

所谓“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sup>[36]</sup>,在脱离校雠学之名的初期,文献学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其局限性在所难免。然而“随着中华文化冲撞交融,科学观念的引入和文献环境的变化,促使一批学者广义地提出‘文献学’这一新概念,他们直接继承了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或拓宽其内容,这就形成了古典文献学”<sup>[37]</sup>,20世纪后期校雠学被文献学淹没。“从古代的校雠学发展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典文献学,既有学理与方法上的精进,也有学科名称上的演化”,“文献学的最终定名,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sup>[38]</sup>。此外,昔日校雠学麾下的“校勘”逐渐演化为“编辑出版学”,档案学与校雠学则渊源更深,因为古代早期的藏书楼往往既是图书馆也是档案馆。诚如吴晞先生所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图书馆史与书史、出版史、校雠史、目录史、档案史等是无法区分的,而且年代越早,这些学科门类越趋于一体。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些不同的范畴才逐渐有了明确的分野<sup>[39]</sup>。近代是文献类学科群各分支学科与传统校雠学的“分家”时期,这些学科的相继独立与发展是校雠学适应近代学术的产物。

#### 5 结语

纵观校雠学的近代境遇,既有西方学术的外在刺激影响,也有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转型需求。在此双重压力下,传统校雠学逐渐丧失固有地位而成为学术史上的概念,但在其母体基础上逐渐衍生出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诸多文献类学科。其中图书馆学是传统校雠学在近现代的主要继承者,其创立本身就是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校雠学在近代不断“对接”的成果。无论是古代校雠事业还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它们的业务工作都是围绕文献采购、分类、编目、典藏、流通等展开的,只不过其工作重心随着技术进步与需求的变化发生偏移罢了。近代中国像一个大熔炉,旧学与新学激烈交锋,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校雠学在这个熔炉里涅槃重生。它在近代的分化与转型,无疑在文献类学科发展史上承担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职责。不管学科如何分化,名称怎样演变,校雠学“学术之宗”的地位都是断然不可撼动的,对其思想的研究与传承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应,基于校雠学母体的众多子学科都应当积极汲取校雠学思想精髓。在图书馆学等文献类学科视域下

重新审视古代校雠学的流变,则既可最大限度地挖掘传统学术之精华,又可为诞生于欧风美雨的诸多近现代学科固本强基,更可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特色化”提供强力支撑。

### 参考文献

- 1 龚蛟腾. 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从校雠学说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216.
- 2 郭天祥. 唐德刚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论”及其意义[J]. 学术论坛, 2006(1): 87-90.
- 3 李满花, 傅荣贤. 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诉求得失评[J].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52(12): 51-54.
- 4 朱汉国. 创建新范式: 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2): 50-57.
- 5 来新夏. 关于转型期历史研究的思考——兼与唐德刚、耿云志先生商榷[J]. 探索与争鸣, 2005(7): 8-9.
- 6 彭斐章, 付先华.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J]. 图书馆论坛, 2004, 24(6): 5-10, 37.
- 7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J]. 图书与情报, 2011(1): 131-134.
- 8 周余姣.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296.
- 9 同7.
- 10 杨翔宇. 民国时期校雠学理论著作编辑探微[J]. 编辑之友, 2015(8): 102-108.
- 11 同10.
- 12 刘亮.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思想的特征、影响和局限[J]. 图书馆建设, 2011(12): 29-33.
- 13 李华斌, 鲁毅. 张舜徽会通校雠学发微[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17-20, 35.
- 14 张三夕. 书林盛事 学术大业——读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目录编》《版本编》札记[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4(4): 182-186, 181.
- 15 程焕文.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批判[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96(4): 14-20.
- 16 吴根友. 从道器观、公私观——看传统价值的近代性蜕变[J]. 船山学刊, 1996(1): 51-60.
- 17 于作敏. 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以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为例[J]. 东岳论丛, 2015, 36(7): 48-53.
- 18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211.
- 19 同1: 75.
- 20 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337.
- 21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08.
- 22 同4.
- 23 李晓明. 20世纪上半期有关校雠学定义的辨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9): 94-99.
- 24 柯平. 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5(2): 138-144.
- 25 同13.
- 26 全根先. 中国近代目录学理论研究之学术遗产[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47-52.
- 27 同14.
- 28 同21: 5.
- 29 同3.
- 30 王子舟等.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仍在路上——纪念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发表90周年[J]. 图书馆论坛, 2015(5): 6-12.
- 31 刘国钧. 发刊词[J]. 图书馆季刊, 1926(1): 1.
- 32 同3.
- 33 王子舟.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J]. 图书情报工作, 1998(2): 1-5, 33.
- 34 李明杰, 许小燕. 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历史演变与现实重建[J]. 图书情报知识, 2016(2): 30-38.
- 35 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前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6.
- 36 郑樵. 通志略·总序[M].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 1995: 15.
- 37 王余光, 汪涛, 陈幼华. 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J]. 图书与情报, 1999(3): 12-19.
- 38 同21: 48.
- 39 吴晞.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991: 3.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湘潭, 411105

收稿日期: 2016年11月14日

## Research on the Modern Situation of Coll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Science

Liu Chunyun Gong Jiaoteng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imes of Chinese social transition and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collation theory had been developed rapidly, of which the scholars was enormou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ntinued to emerge, and the essence of thought linked the past and future. However, it also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at the flaw of stressing theory and despising practice was hard to change, the trend of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brought a powerful impact, and the modern library science made a huge attack. With the gradual differentiation and rapid change of traditional collation theory, library science expands and inherits its main body, and bibliography falls into decline but independent, and other sub disciplines of document type also take what they need from the mother subject and develop its essence. The modern situation of collation theory is actually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nd also is the dominant process of library science, bibliography, philology and other sub disciplines of document type.

**Keywords:** Collation Theory;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Modern Situation